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零工经济中妇女劳动权益的再思考

王梓颖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2月1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15日

摘要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 零工经济兴起, 其以数字平台为依托, 劳动者以任务导向提供服务, 工作模式具灵活性, 但也带来诸多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零工经济劳动关系, 发现劳动者虽获一定自由, 但仍与生产资料分离, 劳动从属于资本且无法占有剩余价值。资本逻辑下零工经济成为资本扩张手段, 是资本与劳动力过剩产物。在此背景下, 妇女在零工经济中参与度高, 但面临劳动权益问题, 如法律保障与社会福利缺失、性别歧视与劳动边缘化、劳动报酬性别差异不平等。为改善此状况, 应提升妇女职业技能与集体组织能力, 推进平台公司社会责任与监管力度, 加强法律法规制定与执行, 从而保障妇女权益, 推动零工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

零工经济, 妇女, 劳动权益, 马克思主义

Reconsideration of Women's Labor Rights in the Gig Economy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Ziying W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November 10, 2025; accepted: December 1,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15, 2025

Abstract

With the impetu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gig economy has emerged. It relies on digital platforms and workers provide services based on task orientation. The working mode is flexible, but it also brings many problems. Analyzing the labor relations in the gig economy from Marxist theory reveals that although workers gain certain freedom, they still remain separated from the means of

文章引用: 王梓颖.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零工经济中妇女劳动权益的再思考[J]. 哲学进展, 2025, 14(12): 199-207.

DOI: 10.12677/acpp.2025.1412621

production, and their labor is subordinate to capital and unable to possess surplus value.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 gig economy becomes a means of capital expansion and is a product of capital and labor surplus. In this context, women have a high participation rate in the gig economy, but they face labor rights issues, such as the lack of leg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welfar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labor marginalization, and unequ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bor remuneration.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women's vocational skills and collectiv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promot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gulatory strength of platform companies, strengthe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o as to protect women's righ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gig economy.

Keywords

Gig Economy, Women, Labor Rights, Marxism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零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一道引人瞩目的新景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渗透和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人们的工作模式正经历着深刻变革。零工经济以其独特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吸引了大量劳动者投身其中，女性群体更是在这一新兴经济模式中占据了相当比例。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剖析社会经济现象的锐利武器，在理解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尤其是妇女劳动权益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资本剥削以及阶级关系等核心观点，依然为我们洞察零工经济背后的本质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参与度日益提升，这一现象既反映了经济转型时期就业模式的多样化趋势，也凸显了女性在平衡家庭与工作需求方面的努力。然而，在零工经济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诸多妇女劳动权益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出发，深入研究零工经济中妇女劳动权益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揭示资本逻辑在当代经济形态中的运作机制，更能为推动性别平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零工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制造业为基础的技术模式，释放了传统工业经济中的生产力，市场和生产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催生的数字平台成为一种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为新的工作组织提供了技术基础。诚如尼葛洛庞帝所指出的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这个时代“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有决定我们的生存”[1]。

(一) 零工经济的定义与特征

在最近几年中，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进步，零工经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但目前在国内学术界中，对于零工经济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且权威的共识。班小辉把零工经济界定为一种互联网数字平台公司利用网络信息对接技术来实现劳动力临时性按需匹配的经济模式[2]。姚建华和房小琪从基于互联网数字平台而衍生出新型工作方式的零工经济出发，认为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工是处于弹性和无保障非正式雇佣劳动关系中的不稳定无产者[3]。谢富胜和吴越认为零工经济是通过数字平台企

业的中介和组织自主提供计件工作的经济形式，包括众包经济和按需服务经济两种类型[4]。王家宝和崔晓萱认为零工经济与传统工作相比，是一种灵活性高、时间短的工作形式[5]。综上，我们不妨可以把零工经济认为是指一种基于数字平台、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劳动者提供以任务为导向而非正式用工形式为主的新型经济模式。

在国外学界，尼克·斯尔尼塞克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揭示了数字平台如何通过数据与算法构成新的资本积累体系；Trebor Scholz 从“数字劳动”角度强调平台对劳动者自由与剩余价值占有的再定义；Shoshana Zuboff 则以“监控资本主义”理论揭示数据如何成为资本控制个体行为的工具。相比之下，国内研究更多关注法律规制与劳动权益保护，如班小辉、谢富胜等人从劳动法与社会政策角度探讨零工经济的制度边界。

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性别化问题”的研究仍相对薄弱。现有文献多以一般劳动者为分析对象，较少聚焦于算法控制与性别结构的交织机制。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融合数字劳动与性别分析的理论框架，旨在揭示零工经济中妇女劳动权益受损的结构性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制度性应对策略。

(二) 零工经济在当代的变化

如今，随着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的进步，人类进入了零工经济时代。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零工经济相较于传统经济模式具备一些独特的特点。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劳动要素以及劳动场所都经历了变化。“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6]

首先，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与劳动力的零工化。在零工经济时代，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者和劳动资料都发生了变化。劳动资料从传统的物质性转变为数据为主，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则转变为零工化的劳动力。一方面，在零工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劳动资料是数据，数据是当代的石油。数据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是因为大数据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经过整理，数据能够转化为有用的信息，还可以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从而产生新的价值，并结合人的劳动时，数据就能在应用中展现其价值。比如，数据能够为计算程序提供竞争优势、协调工人、外包任务给工人，并不断优化和增强生产过程的灵活性。正是由于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应用，对全球的生产、流通、分配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的海量收集和处理成本大幅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作为一种新型且特殊的生产资料，具备零边际成本、可再生性和无物理损耗等特点，成为新型生产资料成为可能。另外一方面，劳动力是劳动过程中的能动因素，而且“作为最多样化的人类能力(讲话、思考、记忆、行动等的潜在能力)的总和”[7]。劳动力向零工化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劳动力的外包和众包。外包是指将重复性或非核心业务交给其他经济体，以减少人力成本；众包则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任务分解并降低难度后交给个人，以降低劳动力开销。总的来说，外包和众包是传统大规模生产方式解体后，资本寻求灵活积累在劳动力方面的表现，企业通过减少直接雇佣员工，使用替代性劳动力来降低成本，实现资本的灵活积累。这表明，产品的生产不需要劳动力集中在一个地点，劳动力可以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生产也可以不在同一时间进行，可以随时进行。

其次，劳动场所的分散化。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需要依赖土地、原材料和大型机器，资本的生产活动必须集中在特定的物理位置。与传统的生产空间相比，零工经济通常依赖于数字平台，这使得许多工作可以远程完成，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地点和空间得到了显著扩展。资本通过改造家庭、社会空间以及线上环境，使得劳动者能够选择适合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的多种工作环境，将其转变为适合生产的家庭工厂和社会工厂，如今，家庭、社会和互联网都可以成为新的生产空间。总的来说，家庭工厂、线上工厂和社会工厂的出现拓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场所，资本通过增加劳动空间来获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借助这些新的劳动空间，资本不断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实现了

劳动过程的“加速”。这种“加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时间上看，除了传统工作时间，休闲时间也被占用为工作时间，虽然零工经济提供了工作地点和时间的灵活性，但也可能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从空间上看，除了传统的工作地点，家庭、社会和网络空间也成为生产场域，零工劳动不再受限于厂房，生产空间包括物理和虚拟两个维度。资本通过“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摧毁了一切物理限制，实现劳动过程的加速。而虚拟空间工作的性质使得传统的监督和管理方式难以实施，企业需要开发新的方法来确保生产力和工作质量。

最后，劳动时间的无边界化。马克思指出，工作日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组成。在零工经济时代，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采取新策略，将人们的休闲和娱乐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剩余劳动。平台公司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技术，或将向劳动者实时推送任务，并利用奖励机制(如高峰期奖励、任务完成奖)吸引劳动者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来完成的任务，如果劳动者在某些时段拒绝任务，可能导致“接单率”下降，从而影响未来的任务分配。这种机制将劳动者绑架在一个“随时待命”的状态中，像网约车司机、外卖员需要随时上线接单，这种即时响应的模式迫使劳动者在本应休息的时间段保持劳动状态。或通过“娱乐化”的包装(如虚拟奖励、排行榜机制)吸引劳动者在游戏或娱乐行为中付出时间和精力，模糊劳动与娱乐之间的界限，而这种行为实际上也是资本化的劳动。在娱乐消遣中劳动者很难去锻炼真正谋生的技能，对于劳动者而言，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一种剥削，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全面侵占。

综上所述，零工经济通过数字化和灵活化的劳动力以及无边界的工作时间和场所，改变了传统生产模式，尽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与便利性，但也可能导致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模糊以及对劳动者个人生活的侵蚀，需要在效率与个人福祉之间找到平衡。

3.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零工经济劳动关系的剖析

在当今的零工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马克思当初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现代零工经济有所不同，但该理论对于理解零工经济仍然适用。为了全面理解零工经济，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该理论，我们可以揭示零工经济背后的资本运作逻辑和剩余价值产生的原理。

(一) 零工经济下劳动者与资本关系的特征分析

第一，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依然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零工经济的核心在于数字平台对劳动过程的重构。零工经济主要依托于各种数字平台，这些数据平台掌握了最关键的生产资料，劳动者虽然是具体的劳动提供者，但他们并不拥有这些核心资源。在某些情况下，零工劳动者可能拥有部分生产工具，但这些工具的使用价值是通过平台的运作实现的。平台决定了劳动者是否能够获取订单、订单的分配规则以及酬劳的计算方式，劳动者对工具的所有权并未带来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由于劳动者被定义为“独立合同工”或“个体经营者”，而非正式员工，这意味着他们与平台之间并没有传统劳动关系下的保障，他们无法通过劳动关系参与生产资料的控制或收益分配。劳动者的收入直接依赖于其劳动的数量和平台规则，缺乏自主性，这种高度依附性使劳动者难以积累资本或改变自身的劳动条件。马克思曾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的手段，更是劳动者与生产关系的现实纽带。”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平台本身已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其通过算法系统、数据积累与智能匹配功能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控制。零工经济虽然通过技术手段重新定义了劳动模式，但未能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基本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分离。这也引发了许多关于劳动权益保护、平台责任和社会保障的讨论。正如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所提出的“平台资本主义”理论，平台公司以数据积累和算法控制为基础，通过掌握基础设施与用户生态形成新的垄断权力结构。

第二，零工经济中劳动依然从属于资本。“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但是，它同时又是与发达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特殊形式：因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则决不必然包含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8]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家通过将工人集中在一起，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无偿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并利用协作和分工的方式组织生产活动，此时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随着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的成熟，劳动逐渐被分割，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上转变为实质上，劳动过程必然转化为价值增值过程。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往往将其自身的劳动工具与平台结合，表面上看，平台公司并未向劳动者提供具体的物质生产资料，也没有对生产资料进行垄断或占有，而是作为信息中介发挥作用。表面上，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似乎是一种合作，其低门槛进入、高流动性和分散化管理的特点，使得劳动者在进出行业和工作连续性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关系有所减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劳动者拥有基本物质资料、享受自由的工作时间和灵活安排工作量的权利，但由于生活资料的资本化以及自我施加的工作压力等现实问题，实际上加强了对资本的依赖。

第三，零工经济中劳动者依然无法占有生产的剩余价值。“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异己的权力，总之，他的劳动如果不是能力，而是运动，是实际的劳动，就会是这样的；相反，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8]实现资本积累的前提之一是资本能够在无需支付等价物的情况下，占有他人劳动的一部分，并不断通过交换更多的活劳动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在零工经济模式下，劳动者通过数字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表面上看，数字平台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平台仅仅是为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提供渠道。在这种情况下，零工劳动对于数字平台而言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这似乎意味着资本并未与生产劳动进行交换，也没有占有劳动剩余价值。实际上，在零工经济模式下，资本仍然无偿占有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为了获得绝对剩余价值，资本既突破了劳动者的身体极限，也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以M平台为例，平台的收入来自消费者支付给司机费用的抽成，占司机总收入的25%及以上。这意味着平台无需预付生产资料成本，也无需为零工劳动者支付可变资本，就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并且还设置了一定的激励机制，最大化激发劳动者的潜能，提升生产效率，提高利润率，而这些利润根本上来源于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算法管理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技术手段，更是一种新的“劳动纪律”(algorithmic labor discipline)。劳动者的绩效、接单率、评价等级与报酬分配均受制于算法逻辑，这种“数字化的福柯式规训”取代了传统工厂监督形式，使劳动者在看似自由的劳动环境中依旧被资本无形支配。算法通过实时监控与反馈机制，塑造了一种“自我规训型劳动”，劳动者为追求系统奖励或评级提升而自觉延长劳动时间，从而加剧剩余价值的榨取。

(二) 资本逻辑下零工经济剥削机制的根源

第一，零工经济代表着资本扩张的新方式和新手段。不同时期，资本有不同的扩张模式。“当资本主义遭遇经济危机时，资本主义会进行重组，资本主义会利用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剥削模式、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市场，创造出一种资本积累的新途径。”[9]零工经济是资本继续实现扩张、积累的另一种新的模式，主要表现为使用零工或临时工，企业减少了传统全职员工所需的福利、保险和其他长期承诺。这种用工模式使得企业在需要时灵活雇佣人手，节省了大量的固定成本。零工经济可以被视为资本积累的新手段，通过对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进行剥削来实现。为了降低成本并促进资本灵活积累，随着数字平台和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平台公司都尽量避免物质资本投入和内部产能建设，通过设施租赁、功能外包和劳务众包等方式获取剩余价值。这意味着零工经济中的资本能够在无需支付预付成本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平台对零工劳动者进行剥削。

第二，零工经济是资本和劳动力过剩的新产物。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相对过剩人口一般被认

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和经济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10]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是零工经济产生的必然结果，成为缓解短期经济压力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失业或经济低迷时期。西方新自由主义倡导灵活就业和弹性工作制度，导致许多劳动者加入了灵活就业的行列，通过数字平台，零工经济吸收并利用了全球范围内所有可用的剩余劳动力，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个人因此成为零工经济直接或间接支配的劳动力。同样地，大量过剩的资本也是产生零工经济的催化剂。为了更好地利用闲置资本和剩余劳动力，资本主义将大量的劳动后备军和剩余资本投放到零工经济中。资本主义意图将零工经济塑造成一种低投入、低风险、精益化和灵活的经济模式，以便从中获取新的资本积累。零工经济成为资本主义在频繁的经济危机和停滞中自我修复和更新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它缓解了资本积累停滞的危机，并以一种新的模式对停滞不前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重组，强化并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范式。零工经济并未颠覆资本的逻辑。相反，它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逻辑。作为当前新兴的经济模式，零工经济并没有偏离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轨迹。

4. 零工经济中妇女劳动权益的现状

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型，零工经济的兴起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结果之一，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市场和家庭中的参与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零工经济为女性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这对于需要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女性来说是一个优势，但零工经济中的工作往往面临收入不稳定、不提供传统的福利、缺乏制度保障、可能面临性别歧视的问题。

(一) 资本逻辑下妇女劳动权益问题的根源

在资本逻辑下，妇女劳动权益问题根源之一是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束缚，这种束缚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交织在一起，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形成了结构性障碍。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较低，这种传统观念在当代依然根深蒂固。部分女性因受传统观念影响，主动或被动地放弃职业发展，将家庭责任置于首位，这种内化的性别观念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削弱。尽管现代社会强调男女平等，但仍有部分人认为女性在独立自主性、家庭责任和事业能力上不如男性。这种偏见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影响了对女性劳动者的看法，导致她们的权益受到损害。当代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效率与利益最大化，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进一步固化了“女性更适合从事柔性劳动”、“低薪”的刻板印象。更有许多现代职场中，性别歧视往往是隐性的，在招聘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没有生育风险”的男性劳动者，缺乏针对女性特殊需求(如产假、哺乳时间、灵活工作安排等)的有效劳动保障政策，这使得女性在劳动市场中难以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竞争条件。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使女性在劳动权益上面临双重压迫。一方面，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招聘时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被认为更“稳定”或不受家庭责任影响的员工，将女性视为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父权制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妇女常被视为主要的家庭照料者，负责育儿、家务等琐事，限制了女性的劳动参与方式和权益保护。而女性在面临多重角色期待与压力时，社会支持理论指出，家庭支持与单位支持的缺失，导致了“工作-家庭”矛盾的加剧。这种冲突表现为时间冲突、精力冲突以及角色行为的冲突，这导致了她们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时间和精力分配上处于劣势。

(二) 在零工经济中妇女角色的参与度

零工经济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技术发展降低了进入门槛，适合需要兼顾家庭和职业的妇女。根据《2019 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女性零工占比达到 52.22%。这表明在零工经济中，女性占据了半数以上的比例，显示出零工经济灵活性和自由度较高的工作模式对女性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女性在线

上零工的比例非常高，远高于男性，这可能与线上零工的灵活性与自由度有关。除此之外，家政服务、美容与护理等职业也深受女性职业者的欢迎，适合需要兼顾家庭责任的女性。妇女在零工经济中拥有多种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她们能够在这一灵活的就业模式中取得成功。零工经济通常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这对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妇女尤其有利。也能让许多妇女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和角色中积累了多样化的技能，她们可以通过自营职业、小型创业项目或自由职业来实现个人职业目标，而不受传统企业结构的限制。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于多任务处理和高效管理时间，这些能力在零工经济中可以转化为高效的工作习惯，零工经济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展示和发挥创新能力的舞台。

(三) 资本逻辑下妇女劳动权益的突出问题

第一，法律保障与社会福利的缺失。法律保障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旨在保护妇女的劳动权益，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法律的实施力度和有效性却常常不足，妇女劳动权益的实现依赖于完善的法律保障和社会福利支持。然而，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部分企业和用人单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规避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在劳动合同签订、产假和育儿福利等方面存在随意性，妇女群体的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政府层面在立法和执行方面也存在不足，无法对妇女劳动权益形成强有力的支持，在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上，立法和执法的不足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性别歧视与劳动边缘化。性别歧视与劳动边缘化是一个复杂且广泛存在的问题，对全球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经济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妇女在就业市场中普遍遭受性别歧视，传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仍然根深蒂固，表现为职业选择受限、晋升机会减少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的固化，例如，从小女孩就被鼓励从事“适合女性”的工作，如教育、护理和文秘等角色，而这些工作往往收入较低且晋升空间有限。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领域由于被视为“男性主导”，女性参与度较低，这种偏见使女性在进入这些行业时面临更多阻碍。尤其是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不仅要求较高的技术能力，还通常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这与许多女性承担的家庭责任形成冲突。妇女往往被边缘化，被迫从事收入较低、缺乏社会保障的工作，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女性在职场上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相似的认可和机会，这不仅影响她们的职业发展，还对她们的薪资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劳动报酬在性别差异上的不平等分配。妇女在同等工作岗位或相似劳动强度下，往往获得的报酬低于男性，许多女性在工作中付出了与男性相同的努力和时间，却仍然面临工资偏低的困境。同工不同酬现象长期存在，尤其是在非正式就业和零工经济领域，这种收入差距更加显著，由于缺乏规范的劳动合同和透明的薪资体系，女性往往更容易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影响。资本逻辑下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劳动力成本的压缩进一步放大了性别薪酬差距，在招聘和薪酬制定时，往往倾向于对男性劳动力支付更高的工资，而女性则被视为可替代的低成本劳动力。这种不平衡的薪酬结构，使得女性在职场上所遭受的经济剥削更加明显，并且进一步巩固了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

5. 改善零工经济中妇女劳动权益的策略建议

“眼下，零工经济正基于移动互联网全球化的浪潮快速成长，在成长过程中，先进入这一领域的平台方和零工经济从业者都面临诸多问题，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11]不可否认，零工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现实的问题。引导零工经济健康积极发展，是每个政府、企业、劳动者的责任和义务。

(一) 提升妇女职业技能与集体组织能力

第一，提升妇女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加强其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加强其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共同努力，提供多样化的职业培训课程。这些课程应关注当前劳动市场的需求，包括技术技能、软技能以及数字素养等方面。此外，应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妇女，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培训机会，以消除经济障碍。同时，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和见习项目，使妇女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提升技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为了增强妇女的自信心和职业发展潜力，鼓励女性参与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活动，帮助她们设定职业目标并制定实现路径。

第二，鼓励妇女在零工劳动者组织化，争取集体谈判权。鼓励妇女在零工劳动者组织化，争取集体谈判权。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从事灵活就业。然而，零工工作往往面临收入不稳定、缺乏保障和权益受损等问题。为此，建立和发展妇女零工劳动者的集体组织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组织化，妇女可以形成集体力量，增强话语权，争取合理的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政府和社会组织应积极推动零工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提供法律支持与培训，帮助她们了解相关权益和法律知识。此外，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案例，推动妇女零工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集体谈判机制，争取建立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通过这些努力，促进妇女在劳动市场的地位提升，实现经济自立与社会参与。

(二) 推进平台公司的社会责任与监管力度

第一，明确平台公司的社会责任。明确平台公司的社会责任至关重要。平台公司应当意识到，除了追求商业利益之外，他们还肩负着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责任。这意味着平台公司需要在薪酬、工作环境、职业健康等方面为零工提供更好的保障。例如，平台可以为零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险选项，确保他们在工作期间受到应有的保护。此外，平台公司还应致力于建立公平透明的算法和评价体系，避免因算法黑箱导致的不公正对待或歧视现象。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平台公司不仅能提升其社会形象，还能增强零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实现企业与劳动者的双赢。

第二，加强零工经济平台的监管力度。加强对零工经济平台的监管力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政府和相关监管机构需要制定和实施更为严格的法律法规，以确保平台公司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审核平台公司的运营行为、劳动者合同及薪酬标准等。此外，监管机构还可以定期对平台进行审计，确保合规性和透明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遏制平台公司可能存在的的行为，保护广大零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监管还需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当前，许多国家的劳动法并未涵盖零工这一群体的特殊需求。因此，立法机关需加快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以适应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可以考虑设立最低保障标准，为所有零工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框架。此外，法律还应规定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责任划分，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三) 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

第一，完善零工经济的法律监管体系。完善零工经济的法律监管体系至关重要。零工经济的兴起为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并促进了创新和创业。然而，这一经济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如劳动者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差、收入不确定等。因此，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保障零工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法规和标准，确保零工劳动者享有基本的福利和权益，例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休金计划等。此外，还应加强对零工平台的监管，确保其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运营，并对其商业活动进行必要的合规审查。

第二，强化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强化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妇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她们的职场中仍然面临着诸多不平等和歧视现象，如薪酬差距、职业发展受限、职场性别歧视等问题。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政府可以通过推行更为严厉的反歧视法律，确保女性在招聘、薪酬、晋升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同时，还应鼓励企业采取积极措施，比如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和完善的产假政策，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此外，加强对职场性骚扰

扰的打击力度，为女性营造一个安全和友好的工作环境，也应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6. 结语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分析了零工经济背景下妇女劳动权益的现状与挑战。研究发现，尽管零工经济的灵活性为妇女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但其劳动报酬的不平等分配、性别歧视以及法律保障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妇女在劳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是妇女劳动权益问题的根源，零工经济作为资本扩张的新形式，在剥削机制上体现出更大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为改善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劳动权益，本文提出了多方面的策略建议，包括提升妇女职业技能与集体组织能力、强化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监管力度、完善零工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促进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也为推动零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零工经济中的性别动态变化，探讨妇女在不同行业、地域中的劳动权益差异，同时加强对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以确保策略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 [1]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 [2] 班小辉. “零工经济”下任务化用工的劳动法规制[J]. 法学评论, 2019, 37(3): 106-118.
- [3] 姚建华. 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J]. 当代传播, 2018(3): 66-68.
- [4] 谢富胜, 吴越. 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J]. 经济学家, 2019(6): 5-14.
- [5] 王家宝, 崔晓萱. 零工经济模式下人力资源的特点、挑战和策略[J]. 管理现代化, 2018, 38(4): 101-103.
- [6] 资本论,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10.
- [7] 保罗·维尔诺. 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董必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06.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66.
- [9] 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42.
- [10] 资本论,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277.
- [11] 吴钦景. 零工经济从“就业备胎”到“大有可为”[N]. 联合日报, 2022-03-16(003).